

# 田桐与辛亥革命

张金超

**提 要** 田桐是辛亥时期革命党领袖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参加革命的经历，诚为一位由接受旧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如何顺应时代潮流，转而追随民主革命党魁全心投入革命，化身先贤志士的真实写照。田桐在发动舆论宣传、丰富革命理论、参与武装斗争、建设党的组织等方面贡献良多。文章以一批较珍贵的史料为基础，重在阐述田桐于革命理论上的建树。

**关键词** 田桐 辛亥革命 文武兼备 理论建设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 (2013) 05-0117-10

20 世纪 90 年代，章开沅先生指出 “辛亥革命不是极少数人的事业，它是由一个数以万计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共同发动和推进的。因此，无论是研究革命运动，或者是研究社会思潮，都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个别领导人，应该把视野扩大到更多的人群。”<sup>①</sup> 章先生的话语蕴意深长，为我们深化研究辛亥革命史指引了新契机。

辛亥革命不仅成就了民主革命的旗手孙中山，也造就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领袖集团。经典作家在评论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时讲到 “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sup>②</sup> 田桐即属于辛亥革命“领袖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是“两者并用”的典型代表，但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sup>③</sup>

田桐生于忧患，但不屈于忧患，毕生为民主共和奔走呼号，致力探索救国兴邦，思维活跃深刻，才艺并蓄，文气横溢，“革命不忘著述，著述不忘革命”<sup>④</sup>，是辛亥时期有名的革命活动家、宣传家。本文以《亡国惨记》、《中兴日报》、《民国》、《太平杂志》、《湖北省政府公葬田梓琴先生专刊》、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有关档案等一批珍贵资料为基础，论述辛亥前后田桐的革命活动，阐发其理论建树。

田桐，字梓琴，笔名恨海，号玄玄居士，晚年署江介散人，1879年12月25日生于湖北蕲春。幼年天资聪慧，英俊不凡，神采外流，其胞弟田桓如是记称“九岁时，父亲尝授以《文选》，即能琅琅上口，有如夙诵。以后年事稍长，更加勤奋攻读，举凡经史百家、故书传记以及唐宋以来的名家文集，无不兼综博览，通其旨趣，因此为文下笔即成，立意新颖，人皆叹服，深得祖父琼林公的抚爱，尝抚其背而称之曰‘此田氏克家儿也’”。<sup>⑤</sup>田桐曾自述“不文幼事家庭教育，严君之性素严谨，所勗不文者，皆圣贤之学，如张横渠之《性理精义》、朱紫阳之《近思录》、陈榕门之《五种遗规》诸书，日眊于不文之耳膜者，殆百数十遍。”<sup>⑥</sup>他还喜欢游历，“弱冠尝子身登庐山，遍览诸名胜，后乃读书白鹿洞，同学迹之，辄不知所往。”<sup>⑦</sup>传统教育和游历喜好，对其后的革命活动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田桐二十岁补县学生，同年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与宋教仁同学，目睹西方列强“兵戎相见”和朝廷当局丧权辱国，始而“肆谈革命”。1903年冬，因在考卷上“鼓吹革命”，为教员告密，被巡抚端方视为大逆不道，责令从严惩办，学校监督纪巨维因赏识他的才华，“讽令其适避祸”<sup>⑧</sup>。田桐旋赴日求学，逐渐走上革命道路。

1900年后，中国留日学生逐渐增加，1901年274人，次年增至574人，1903年逾千人。<sup>⑨</sup>于此期间，革命思潮涌动，党人群起。田桐与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章太炎、胡汉民等一批志同道合之士，情同手足，并肩于民主革命道路。成立团体，宣传主张，推动革命运动，为此时革命党人的中心工作，田桐紧紧围绕上述任务开展活动，被友人称为“水牛将军”<sup>⑩</sup>。

### 1. 编辑刊行《亡国惨记》

《亡国惨记》1904年由东京秀光社发行。田桐的叙言，开篇即为重锤，宣称“古今最惨之事，莫如亡国。亡国之惨，又莫如我中国之明季”。作者将之归因为“变种”和“变相”，“变种之原因，世界之人种无虑百数十，可一言以蔽之曰：其最丑者莫如满蒙之鞑子，故人之恶鞑子也，甚于恶狐鼠。”至于后者，“我中国自古以来，衣冠文物之盛，冠绝群伦，故其时如越南、如缅甸、如暹罗、如朝鲜，莫不钦慕文明而为华化也。乃清虏入关，豚其尾而鼠其头，奇其服而异其言，屈一足垂一手以为礼，及种种怪异之形状，直大远于人道，而与禽兽无异者。”“变种”、“变相”论给满清统治者以很大程度的丑化和诋毁。

《亡国惨记》共录文十余篇，各篇均注出来源，约十万字。编辑缘起为“是书系明季我祖我宗痛我华土被夺于膾胡，且身历其境，见夫膾胡残虐惨无人理，屠戮生灵、奸淫妇女之种种目不忍见、耳不忍闻之事，恐我子孙于经过大劫之后，忘九世之仇讎，故笔之以遗后世”。章太炎题辞曰“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除，汉道将何冀。”日人宫崎寅藏撰有弁言，对邻邦的排满革命深表同情，谓“顷吾友恨海氏，又将所编之《亡国惨记》一卷，出示余。余读之竟，乃皆系满洲入关残杀汉人之一部惨历史……，呜呼！天道好还，人道不可以一日或灭。满洲人如此，其应受诛戮淘汰之列，可无容疑。是满洲人被排之结果，其为支那人之雪愤复仇者，其事小；其足以彰世界文明之公理与正义人道者，其事大。”<sup>⑪</sup>将中国革命赋予“彰世界文明之公理与正义人道”的地位，从更高层面阐明了编纂出版《亡国惨记》的时代价值。

《亡国惨记》刊行后，一时洛阳纸贵，风行日本东京、南洋、香港及美洲等处，不及一年，售逾三万册，“上海及内地有禁令无敢代售者，持往者则有之，可见人心覆清之心，是时至为激

昂也。”<sup>⑫</sup>革命党人还设法广为宣传。《民报》广告称：中国太炎章炳麟先生题词，日本白浪庵滔天宫崎寅藏先生并言，“是书乃记鞑虏入关残杀我祖宗之惨状之实录……，顷同人等搜遗老之家藏，集海外之散佚，编成此书。观其内容，始知我祖宗之羞辱痛苦与鞑贼之残虐刻毒，无微不至，是以人人读之，莫不堕泪。同胞，同胞，而亡清鞑子之虐尔祖乎？盍读《亡国惨记》，以触目惊心？”销售处有大华书局、支那留学生会馆、民报社、中国日报馆四处。<sup>⑬</sup>稍后又刊登消息称“是书写满清入关以来虐待我祖宗之惨状，字字悲哀，字字血泪……，是诚具有良心与有民族观念者不可不读之金丹品也。”<sup>⑭</sup>新加坡《中兴日报》载“《亡国惨记》再到，但所到无多，爱阅者快来购取。”<sup>⑮</sup>以上报导，足见《亡国惨记》发行量之大，影响范围之广，不亏为同盟会时期革命派重要的宣传品。

## 2. 追随孙中山创立中国同盟会

1905年6月，田桐与刘仲文、白逾桓等在日本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鼓吹民族主义不遗余力，为同盟会的成立作了舆论准备。<sup>⑯</sup>7月，孙中山自欧洲到日本，拟组筹全国性的革命组织，田桐动员杂志社百余成员入会。8月上旬，为张罗开会欢迎孙中山，田桐出力甚多。据《宋教仁日记》1905年8月9日载“申初，偕田（梓琴）、张（步青）至富士见楼租房间（因欲开欢迎孙逸仙会），未成。”11日记“田梓琴来，言租富士见楼房间，已定于十三日下午一时至六时开会，余遂嘱梓琴书邮片发各处。”<sup>⑰</sup>在田桐等人的努力下，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于8月13日成功召开。20日，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田桐被举为评议部议员，后任书记部书记，负责机要。<sup>⑱</sup>

同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田桐愤激异常，四出联络，并在弘文学院组织罢课抗争。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有清廷驻日公使杨枢1906年3月致日本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的照会，列了一个组织反取缔规则的19人留学生名单（田桐名列其中），要求日方不准这些人入日本学校。<sup>⑲</sup>1906年5月，田桐和柳亚子等在上海创办《复报》月刊，同《民报》相呼应。因田桐在革命活动中活跃，被清廷下令缉捕，再次亡命日本。

## 3. 发扬革命言论

《民报》成立后，革命派与立宪派展开论战，田桐在读到《民报》第四号汪精卫的《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后，致函民报社，痛批“非革命论”。他说，“夫革命论也，而竟有非之者哉？鄙人不责非革命论者，而正有不满于诸公之驳非革命论者，何其不自尊与不自爱而褻其笔墨一至此哉？”《新民丛报》为立宪派机关杂志，梁启超为清廷弄臣，而要求其对于革命表同情，“则犹之对牛而弹七弦琴，自其不肯听之方面言之，则犹之遇仇人之出刃刺我，而责其不仁也？”田桐又补充指出，梁启超已非今日之中国人，而为“昔日之中国人”、“自甘为非人之类”，革命派与梁启超的仇恨自然是公仇，但“革命与不革命，于彼之本心毫无关系，于彼之最终目的亦毫无关系，其所以勉强牵涉而及于革命之言者，徒取巧以博鞑廷之欢心”；革命派不应该将保皇派立于“相对辩论之域”，因为“如所与辩驳者之非其人，而只自损吾价值”。奉劝党人慎骂梁启超，因“受骂之程度愈高，则其做官之时期愈熟”。并得出结论“《民报》出现，国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渐浸盈于同胞之脑海，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之，……故数月以来之《新民丛报》，为梁启超一人所作之《新民丛报》，党派之机关杂志忽变而为独夫之机关杂志，此真千古未有之惨状也。”<sup>⑳</sup>

为了支持中国人的革命事业，日人宫崎寅藏等在极为艰难的处境中创办《革命评论》，以相

呼应。田桐闻之慨言“警眼全球革命场，西欧战捷又东洋。直教腕力降魔鬼，那把人权牧虎狼。弹药裂开声霹雳，旌旗摇曳血玄黄。人间从是应平等，谁改低头颂帝王？”<sup>②</sup>此诗充分表露了作者的国际视野和无畏的英雄气概。

1906年12月2日，在《民报》周年庆祝会上，田桐阐释了自己的革命观。他指出，当下与人们关系密切的是“时代”和“事业”四个字，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亡国的时代”，要救国就要做“革命的事业”，而要做“革命的事业”，就要讲究“革命的学问”、实行“革命的教育”、兴办“革命的学校”，接着对“支持革命但不愿承担义务”、“中国人程度低，五十年后才能革命”、“毕业后通过做清廷的官来实行革命”三种论说逐一批驳。他将革命思想的产生，归结为“良心”和“耻心”两条“良心不死”，不能不革命，受满族的统治，为奇耻大辱，舍革命无他途，“男儿气节刚于剑，不灭清胡死不休”，热血男儿应起而革命。<sup>③</sup>整篇演词一气呵成，鞭辟入里，催人奋进。

旅日期间，田桐的组织和理论才华初显。他为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做了前期准备工作，因此在组织成立后被委以重任。他的言论围绕民族主义展开阐述，批驳清廷的颛顼愚昧，鼓吹革命之势与理，语言犀利，发人深省，很快在留日学生中脱颖而出。

## 二

面对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发展，孙中山等计划在祖国边陲举义，动摇清廷的统治根基。而此时以康有为为首的立宪派在国外大造舆论声势，宣扬立宪论调，大肆攻讦革命。为廓清立宪派的谬论，争取华侨的支持，革命派将重心自日本转至南洋，两派在海外再次掀起论战，田桐与胡汉民、汪精卫等为主力。

1907年5月，孙中山在香港谋划潮州黄冈起义，令东京同志赴港相助。田桐于7月抵达香港，可惜黄冈之役经已失败。11月，他与何克夫、谭人凤等携革命军债券欲投身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行至海防，为法吏拘捕，年底被逐出境。旋受孙中山委派，赴新加坡主持《中兴日报》笔政，与当地保皇党机关报《南洋总汇新报》“文战经年，争论革命立宪不休。”<sup>④</sup>《中兴日报》以是成为南洋革命党人的主要舆论阵地。

### 1. 痛批立宪论调

1907年12月，康有为联合海外华侨上书，提出三年内召开国会的主张，《南洋总汇新报》刊文响应，革命派予以迎击。田桐撰有《泣告同胞之希望立宪者》、《革命军与响应军》、《可怜要求开国会者之穿头路》等30余篇檄文，“大受英荷两属侨胞之欢迎”<sup>⑤</sup>。

在《泣告同胞之希望立宪者》中，田桐讲到，“革命功成，即我同胞离脱苦海之纪念日也”，而清廷动议立宪，是“不得已而行自利其族者，以诡吾族之计”，此语无异于对立宪论者的当头棒喝。接者指出，满人立宪，于汉人必无利益，而且大有损害；满人立宪成功，希望立宪者必没有好位置；立宪必无成功之日，即使成功，内忧外患将甚于今日百倍；满人心中并无立宪二字，且立宪并无定期；希望满人立宪与希望汉人革命者势不两立。坦言“希望立宪者，决无好结果，公等原欲得好结果之故，而始希望立宪，乃其结果而竟大不如愿，且自贻伊戚，吾为公等计，未免失策太甚也。……倘公等而犹有疑团也，请于清夜平旦时，细思希望立宪之结果。”<sup>⑥</sup>

5月底，田桐又刊行《清首相与立宪》一文，对立宪论者再予痛击。作者以为，立宪论倡之于满人，而无耻的汉人附为之附和，“以供谄媚之资耳”。《商报》曾载有“杨度痛陈准开国会之利

益，惟庆王漠然不动于心”的消息，田氏据此称，庆王为清廷之皇族兼首相，满人如果真心实意想立宪，“则庆王当为满人力谋国会之成立，遇有关于国会之议论、关于国会之方略，当唯恐其用之不尽，采之不周。”但事实并非如此，清廷拒开国会。作者叹曰“夫满人之所以倡立宪说者，为收拾汉人之心之手段，而并非欲见于实行。”派大臣出洋、改革官制、设立谘政院等，皆“从皮毛下手”，“满人今日之立宪，饰人耳目之行为也。”<sup>②6</sup>

1908年夏，政闻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上奏朝廷，请定三年召集国会，把主张缓行立宪的赴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革职，以谢天下，此举激怒朝廷及守旧大臣，清廷下令将陈革职，查禁政闻社。田桐斥其曰“满人之不愿开国会，吾等早已见及之，非俟陈景仁之案出而始知也。要求开国会者之必致见罪，吾等亦早已见及之，亦非俟陈景仁之案出而始知也。”进而分析到：“况于式枚者，乃反对立宪之主力者，载湉且袒护之，是明明对于‘立宪’二字，乃面从而心违也。谓开设议院，头绪纷纭，需时若干，是为将来迁延之张本也。”<sup>②7</sup>

## 2. 追踪报导国内革命活动，发阐革命理论

1908年4月底，孙中山派黄明堂、关仁甫、王和顺等在云南举义，革命军一举攻占河口。田桐对此密切关注，称“我军于前晚（廿九）又有克复河口关之捷报。夫河口附近之清军，凡六营也，其数不可谓不多矣，何以一举而尽数降我？此其故盖有二：一则以人心思汉，民族之观念迫于胸中。一则为白金柱之问题。”预言革命军“从此大发展者”有六事：与粤军互相声援；革命军之文明；云南人恨满之深入骨髓；破河口关之主将，即破镇南关之宿将；革命军得河口，贼军必将气馁；革命军之神速。并宣称“我军成功之期可以预卜，中国之前途，从此必有起色”。<sup>②8</sup>

田桐接着分析革命军与响应军的关系，他根据历史经验指出“我国自古革命军之起，所患者响应军之少耳”。若响应军少则其事必败，反之则其事必成。又结合现实情况强调“今日之人心，则较激于昔日千百倍；今日之交通机关，较灵捷于昔日者又千百倍；今日之各地方，革命团体较多于昔日者又千百倍”。昔日的革命者，多有私心，今天的革命者，纯属公心；昔日的革命者，多为无赖之夫，今天的革命者，多系全国人望，“人心激，则响应者大；交通机关灵捷，则响应者速；革命团体多，则响应者众；革命者出于公心，则响应者效力勇；革命者为人望，则响应者倾心切。”<sup>②9</sup>

审视势如破竹的革命形势，田桐认识到，“夫我国革命举动，自开国以至于今，不下三十次，然其所历年数，或二十年，或十年以上，未有如今日之盛，不及一句，得地千里者。”革命军进攻北京，直破虏巢，指日可待。革命军神速的原因有“民族思想普及国人”、“我军之实力充足”、“我军惠民如子”。以上三者，有一如此，“未或不兴，况三者俱备乎？天戈所挥，当者立碎，义师所向，应者如云。如此不使之神速，天下宁有是理耶？”<sup>③0</sup>

革命党还制造舆论声势，宣扬革命派已获得交战团体资格，描绘列强在起义者与清军之间保持中立的形象。田桐讲到“云南之中华革命军已成之堂堂正正交战团体，法政府之态度既如此，法之新闻又颂扬其举动之文明，合于国际法。日本各新闻，亦如之。本坡昨日西报，又之复如之。欧美各新闻，目下虽未得见，然天下之公理，一而已矣。”<sup>③1</sup>此论已出，引起保皇派的反驳，徐勤认为果真如此，那么镇南关之役后的六十名起义者就不应该被法当局驱逐出安南，河口之役后的起义者也不应该被禁止进入安南境内。中国的革命得不到西方人支持，因为有人种的差别，又有语言方面的悬隔，他们对中国人没有感情。<sup>③2</sup>可惜的是，之后没能看到革命党人的回应

文章。

田桐又探究了革命心理问题。指出革命之心理即合良心、是非心、仁爱心、侠义心、廉耻心、孝心、慈心、悌心、爱国心九者为一之心理也。革命心理发生的结果有二：一为愤勇心，“积不能平者则生愤，理直气壮者即为勇”、“愤则足以使敌懦，勇则足以使敌怯”；一为不怕死心，“平日最怕死者，当革命军兴之日，而怕死之心顿失，非前后如出两人也，气之所至心不能主焉。”最后申明，“革命心理者，人性的美的方面发生之心理也；革命心理者，非个人之心理，乃社会之心理也；革命心理者，愈经失败而愈进步愈坚固之心理也”，“革命心理之感动，无微不至；革命心理之趋向，无事不成。”<sup>③</sup>

田桐又利用语言优势，选译《大阪每日新闻》、《报知新闻》等外媒中关于中国革命的报导载于《中兴日报》，篇目有《日本报之云南革命观》、《清国革命军》、《云南革命之骚动》等，这对于时人了解革命形势的进展，大有裨益。田氏还撰有《土耳其革命大成功》，译有俄国文学作品《俄国之革命党》等，希冀以外域革命经验与教训，为中国革命之镜鉴。

### 3. 谋取“中央革命”

1908年，应荷属侨商邀请，田桐至泗水创办《泗滨日报》。后因翻译日本大越英三郎的《南国记》，披露荷兰殖民者虐待华侨的罪行，被勒令离境，“侨商多挥涕相送，如失师保”<sup>④</sup>。

鉴于南部边陲的起义屡起屡败，田桐省思革命方策，意决试举“中央革命”，认为“稽诸各国革命史，各国革命党无不向中央政府进攻，卒成大业，吾党历年均在海疆各省计划举事，实不足以制虏之死命，此后吾党分一部党员专在京畿一带从事活动，庶可收擒贼擒王之实效。”<sup>⑤</sup>后潜入北京，创办《国光新闻》，以“倡导立宪，排斥官僚政治”为掩护<sup>⑥</sup>，宣传革命。又与景定成、井勿幕等联络同道，伺机谋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田桐随黄兴经上海赶赴武昌。11月3日，被湖北军政府任为司令部秘书处秘书长。在保卫汉阳的战斗中，亲临前线，临危不惧，献策“尽取汉阳兵工厂钢板置濠堑间，以御銃弹”<sup>⑦</sup>，汉阳战役因之坚持至11月底。黄兴事后曾言“吾始以梓琴为文士，今乃知其智计亦大过人也”<sup>⑧</sup>。田桐还趁暇登上黄鹤楼，赋怀一首“十载未登黄鹤楼，而今俯瞰快双眸。亡秦终是楚三户，阵阵铙吹动上游。”<sup>⑨</sup>12月下旬，孙中山从国外归来，受黄兴之遣，田桐与时功玖前往上海迎候。<sup>⑩</sup>

次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田桐任内务部参事、临时参议院议员。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他到北京续办《国光新闻》，抨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6月，共和党机关报《国民公报》诬称南京临时政府为“假政府”，田桐忿然不平，与白逾桓、仇亮等将该报馆砸毁，轰动一时。<sup>⑪</sup>1913年，当选众议院议员。宋教仁遇刺，赶赴上海敦请孙中山兴师讨袁，旋持黄兴手书到武汉<sup>⑫</sup>，促成湖北改进团成立。后与张汇滔赴安徽举兵，失利后走避日本。

南洋时期，依据孙中山的部署，田桐投入到同立宪派的大论战中，成为舆论界的急先锋，批驳对手入木三分，文词辛辣，极富战斗力和感染力。同时，追踪革命消息，分析革命形势，探研革命方法，关注华侨华人的生活状况，理论才华得以充分展现。“中央革命”想法初衷甚好，未及实现武昌起义爆发。阳夏之役，亲临战场，献计献策。二次革命发生后，倾力讨逆，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追随者。

## 三

为捍卫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彻底推翻封建残余势力，孙中山、田桐等人思谋中国的前途与

未来。同时伤感于国民党涣散无力、革命组织有类于散沙、党员革命意志淡漠，于日本东京着手组织中华革命党，以谋“第三次革命”，扭转革命态势。

## 1. 参与筹备成立中华革命党

遵照孙中山的嘱咐，田桐于1914年4月30日详细登记党的骨干名单，内分“各省重要人物一览表”和“未曾加入团体之重要人物一览表”。前者共38人，详列姓名、籍贯及主要职务，标出“重要人”、“次要人”、“已离日本”三类；后者计19人，同样列出姓名、籍贯及此前主要职务，标注“主张进行之人”、“联络中”、“已离日本”。<sup>③</sup>清单为人们了解初期中华革命党的人员构成提供了一份基本的参考数据。

5月14日，田桐发出中华革命党成立筹备委员会的通知，曰“顷得孙先生面示：本党干部未曾成立以前，组织一筹备委员会，所有人员委任如下……”，并补充道“复接孙先生面示：本月十六日早八时半在民国社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务乞按时临会。”<sup>④</sup>

田桐还与意见相左的同志如黄兴等人保持了良好的关系。6月16日，黄兴致函田桐称“前兄尚留有祝世禄字在弟处，并徐天池画。弟因有他行，请来取，以免遗失。”26日，又来函：“弟将远适，特于明日（廿七）午刻备小酌，恭请中山先生叙别（不谈国事）。乞届时驾临寄寓，藉慰离绪。”<sup>⑤</sup>

7月8日，中华革命党成立，《党章》规定，凡欲入党者，无论其在党内的历史及资格如何深久，皆须重写誓约，加按指模，以示坚决，强调党魁的权威及党员的绝对服从。革命党人意见分歧严重，黄兴、朱执信等持怀疑、观望态度，田桐、陈其美等则坚决支持。田桐任党务部副部长，参加本部领导工作，后又被委为湖北支部长，旗帜鲜明，紧紧追随孙中山，做了不少党务工作。

## 2. 拥护孙中山的领袖权威

田桐专文重墨论说“名誉”、“人格”、“权威”的要旨，强调“服从首领”的重要性。他动情地呼吁党人拥护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同心戮力，竟成辛亥大业。该时期田桐的重要理论著作有《名誉论》、《品性论》和《革命之首领》。

《名誉论》<sup>⑥</sup>重在阐释名誉的种类及名誉同名声的关系。

田桐认为，“名誉二字，深中一般人脑底，牢不可破。优秀者求之，庸愚者亦求之；无耻官僚求之，即蠢尔蛮族，亦莫不求之。不已之务，专求诸人，求之愈切，离之愈远。”与名誉心有关系的是尊大心和虚荣心，“尊大心者，自己之价值，自己能确信之”。虚荣心者反之。“尊大心者，自信力强，无待于外。虚荣心者，自信力弱，以他人之证明为目的，故待他人之称赞也。”

名誉可分为人格的、职务的、男女两性对互的名誉三种。人格的名誉，“为尊重人间相互的权利”。职务的名誉，“有适当其职务上之技能，完足其职务上之义务”。男女两性对互的名誉，“盖女子未嫁以前，其身不可污；既嫁以后，唯托身于一姓。男子既冠，执行婚礼，有终身保护其妻室，不使丧失其节操之义务。”作者又指出，对于教育不发达的社会，往往特别容易产生“下流的”和“蛮族的”两种名誉。

对于名誉与名声的关系，田桐指出，“名誉者，一时性也；名声者，万古性也。”名声由功绩获得，而获得功绩的途径，可分为事业和制作，事业须要大量制作。并且，“名誉者，乃人人可以分得，又可以取得于人。名声者，不可以与人，又不可以取诸人。”作者最后明言，“著作之名声，难中之难者；教训的著作，又较娱乐的著作为难。至于哲学的著作，其难无以复加

矣。”名声固难得，但如果得之，则容易保持。

《品性论》<sup>⑦</sup>主要论析人的品质与性格的相关问题。田桐开宗明义指陈“心乎内者谓之德，施诸事者谓之道，本诸内以发诸外者谓之品性。道德者，品性之府库；品性者，道德之光辉也。”善与信，属于道德范畴，充实而有光辉者为品性，“故论品性者，多由人物之性格归宿于道德之途而言之。”从外部观察，品性者，道德之特征也；自内部观察，品性者，道德的修养也；自其特性之价值言之，品性者，道德之精力也。作者最后强调，品性影响终身，人生如何结局，皆由自作而成。无论受外界的影响如何强烈，但本心本性的主张，不会因之歼灭无遗，“才相若也，何以有成功失败之不同？智相若也，何以有贤哲窃盗之不同？品性之不同为之尔！”

《革命之首领》<sup>⑧</sup>原为《革命之哲理》的第一章，后以单行本刊行。著者指出“二次革命以来，再走东海，复事弄潮，兼攻斯理，始知革命起原及结果为政治问题，革命起原至结果之间，其革命党徒心理之状态则为哲学问题。常不自揣，欲著一书名曰《革命之哲理》，惟以精力、时间两不我与，久而未成。是册专论革命首领，乃全书之一章。”全书万余字，较系统地论述革命首领的发生、假借、种类、资格、信仰心、威严、宰制力等内容。

### 3. 切实解决革命同志的生计

为了把四散的、失却联络的同志组织起来，孙中山、田桐等成立通讯机关，调查登记亡命者的地址和状况，给最贫困的同志每人做衣服两件，每月发日币津贴十五元，“使一大批衣食无着、告贷无门的革命党人，精神为之一振”。<sup>⑨</sup>

1914年12月26日，田桐致函财务部部长谢持，谓“敝省党员向君海潜困窘异常，去时所允之款及衣服费十元，望即付给，”<sup>⑩</sup>次年1月20日，再致函谢持，称“敝省党员李君祖贻，去岁十月以鄂事东来，除由尊部贴医费五元及腊月十元外，绝无他助。现房东准备休业回乡，不能终日。日前弟与英兄商酌，筹办川资回沪。如一二日不能办到，望即刻给付多寡，将馆账清还，另搬他处。”<sup>⑪</sup>2月25日，他又电致总务部，讲到“敝省党员石璜明迁入寄宿舍，须偿馆账五十元，孙镜须馆账三十元，望尊部筹给。”<sup>⑫</sup>3月10日，因湖北支部同志的生计问题，写信给陈其美与谢持“江庆林二月馆账未偿，须二十元，望交丁景良或曾省三代付”；“孙镜欲搬入寄宿舍，惟须四十余元，有钱时祈囑中孚兄或景良办理”；“石璜前欲入寄宿舍，目下因有数人学英文，月可得火食费，此后可不仰给本部，惟从前欠人者，有五十元之谱，请求党中给与。”<sup>⑬</sup>

《名誉论》、《品性论》和《革命之首领》的撰就，使田桐的理论水平达到了新高度、新境界。“三论”表面上尽管没有直接论述孙中山的领袖和权威地位，但内中的隐喻，不言而喻。关心下层党员的生计，无形中凝聚了党气和人气，提高了领袖和党的威望。

## 四

时势造英雄，英雄写历史。田桐将青春奉献给了民主革命，而辛亥革命也成就了田桐的非凡功业。田桐无愧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早期革命党的骨干。

田桐文武兼备，两者相得益彰，“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在他的身上很好地结合。有论者如是勾勒了田桐的生命轨迹“清室自甲午覆师、戊戌政变以还，内政外交腐败至莫可言状，先生环顾大势，义愤填膺，不忍以大好河山沦亡于淫威之下，亟思有以倾覆之，是先生革命思想实基于此。厥后大江南北，联络革命同志，往日本组织留学生革命机关报，发扬主义。又赴南洋各处，劝华侨办报章，兴学校，灌输革命思想。至北京创办《国光新闻》，为北方革命机关

报，厥功甚伟。辛亥革命一役，丙辰洪宪之役……，几无役不参加。”<sup>①</sup>田桐主笔或参与主办《民报》、《复报》、《中兴日报》、《泗水日报》、《国光新闻》、《民国》<sup>②</sup>等，著编《亡国惨记》、《南国记》、《英雄模范》、《革命之首领》、《亡国泪》<sup>③</sup>等，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令人难以望其项背，在晚清民国新闻史、出版史上确应占有一席之地。

田桐的著述，形式多种多样，内容深刻透彻。他既任总编、主笔，撰写政论文章，又著编（译）出版专书；宣传革命思想深入浅出，探究革命理论剖根究底，批驳政敌有理有据；既从历史经验中汲取营养，又擅长借鉴异域经验，翻译大量外文著作。文章立论新颖，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思辨能力强，批驳对手体无完肤，常令其哑口无言。理论才能堪与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等人比肩，是革命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

田桐革命立场坚定，始终如一。自从与孙中山结识后，就竭尽全能，成为孙氏的得力助手，服从组织，贯彻主义，克勤克俭，任劳任怨。勿庸讳言，由于误解等原因，1909年前后，田桐曾一度参与倒孙风潮，但这并未丝毫减少他的革命热情和影响他与孙中山等同志间的革命友谊，相反，误解很快消除后，却更加坚定了他对领袖的服从和对主义的信仰。到了中华革命党时期，为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田桐顾全大局，在组织建设和理论建设上均有很好表现。

①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2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6页。

③目前学界关于田桐的研究成果不多。台湾地区有姜龙昭《英风遗烈——田桐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该书为文学传记，并非严谨的史学著作，征引文献有限。大陆方面，以田氏小传居多，未有专文探研。

④⑧⑤湖北省政府编《湖北省政府公葬田梓琴先生专刊》，武汉，1932年，第9、10、7页。

⑤田桓《忆先兄田桐》，《蕲春文史资料》，第4辑，1991年，第28页。

⑥恨海《〈英雄模范〉序》，新加坡《中兴日报》，1908年5月25日。

⑦②③④⑤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1、153、154、149页。

⑨李喜所著《中国留学史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54页。

⑩据冯自由记：1906年某天，田桐与章太炎闲谈，偶及田单驱火军破燕事，田曰：“田单在古代用火牛，吾谓今人可用水牛。若革命军举事，清军有马队，而革命军无之，吾人大可预训练水牛以临阵，必可制胜”。章太炎曰：“乃祖用火牛而后人更发明水牛战

术，可谓后先媲美。”众大笑，自是人咸以水牛将军称之。《水牛将军田桐》，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148页。

⑪宫崎寅藏（滔天）：《弁言》，《亡国惨记》，日本东京：秀光社，1904年。

⑫江介散人《革命闲话·亡国惨记》，上海《太平杂志》，第1卷第1号（1929年10月）。

⑬《〈亡国惨记〉上卷出现》，日本东京《民报》，第9号（1906年11月）。

⑭《亡国惨记》，日本东京《民报》，第10号（1906年12月）。

⑮《大注意》，新加坡《中兴日报》，1908年6月17日。

⑯江介散人《革命闲话·二十世纪之支那》，上海：《太平杂志》，第1卷第1号。

⑰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48~549页。

⑱江介散人《革命闲话·同盟会成立记》，上海：《太平杂志》，第1卷第1号。

⑲迟云飞《陈天华、宋教仁留日史事新探》，北京：《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

⑳恨海《来函·其二》，日本东京《民报》，第5号（1906年6月）。

㉑《读〈革命评论〉有感拜赠〈评论〉社诸君》，日

本东京 《革命评论》，第6期（1906年11月25日）。  
转引自章开沅 《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第256~257页。

②民意 《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辞》，日本东京 《民报》，第10号（1906年12月）。

③江介散人 《革命闲话·海盗之讼》，上海 《太平洋杂志》，第1卷第2号（1929年11月）

④恨海 《泣告同胞之希望立宪者》，新加坡 《中兴日报》，1908年3月20、21日、23~26日、31日连载。

⑤恨海 《清首相与立宪》，新加坡 《中兴日报》，1908年5月28日。

⑥恨海 《可怜要求开会者之穿头路》，新加坡：《中兴日报》，1908年8月12日。

⑦恨海 《云南革命军之战捷》，新加坡 《中兴日报》，1908年5月1日。

⑧恨海 《革命军与响应军》，新加坡 《中兴日报》，1908年5月4日。

⑨恨海 《革命军神速之原因》，新加坡 《中兴日报》，1908年5月6日、7日连载。

⑩恨海 《法国对于革命军之中立及革命军在国际法上之地位》（再续），新加坡 《中兴日报》，1908年5月19日。

⑪亦市 《论革命必不能行于今日》，新加坡 《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6月29日、7月1日连载。

⑫恨海 《革命之心理》，新加坡 《中兴日报》，1908年6月5日。

⑬郑天挺、荣孟源主编 《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下，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第450页。

⑭⑮张难先 《湖北革命知之录》，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127、131页。

⑯叶素珍 《战时总司令部秘书长田桐》，武汉 《武汉文史资料》，1988年第1期，第223页。

⑰毛注青 《黄兴年谱》，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9页。

⑱徐辉琪 《田桐》，宗志文、朱信泉主编 《民国人

物传》，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5页。

⑲⑳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 《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14~315、362页。

㉑田桐 《呈总理各省重要人物一览表》，黄季陆主编 《革命文献》，第45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第95页。

㉒田桐 《中华革命党筹备委员会人员名单》，黄季陆主编 《革命文献》，第45辑，第93~94页。

㉓玄玄 《名誉论》，日本东京 《民国》，第1期（1914年5月10日）。

㉔玄玄 《品性论》，日本东京 《民国》，第3期（1914年7月10日）。

㉕田桐 《革命之首领》，日本东京：民国社，1914年12月23日。

㉖王杰 《中华革命党略论》，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湖南省历史学会编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选》，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53页。

㉗《致谢持函》，原件，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

㉘《田桐为请接济李祖貽致谢持函》，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48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第155页。

㉙《致中华革命党总务部函》，原件，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

㉚《致陈其美谢持函》，原件，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

㉛对《泗水日报》、《国光新闻》，笔者也做了一定努力去搜寻，但目前藏处仍然不详。

㉜《田桐译著书目表》，田桐述 《人生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21年，封三。

作者简介：张金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广州 510610

责任编辑 陈子先